

正确认识“一带一路”

□ 陈积敏

目前，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等重要决议也纳入“一带一路”建设内容。但是，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不清楚、不理解的地方，甚至存在着误解与曲解。笔者去年对日本进行学术访问时，在与日本著名高校、智库以及研究机构的座谈中发现，日本对于“一带一路”的认知不多，且存在偏差。因此，我们仍有必要梳理一下“‘一带一路’是/不是什么”“‘一带一路’给世界带来了什么”等基础性重大问题，这不仅有助于“一带一路”的持续推进，也有利于促进中外之间的理解与交流。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不断拓展合作区域与领域，尝试与探索新的合作模式，使之得以丰富、发展与完善，但其初衷与原则却始终如一。这是认知与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点与关键。

“一带一路”是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而非排他性、封闭性的中国“小圈子”。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中国认为，只有开放才能发现机遇、抓住用好机遇、主动创造机遇，才能实现国家的奋斗目标。“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把世界的机遇转变为中国的机遇，把中国的机遇转变为世界的机遇。正是基于这种认知与愿景，“一带一路”以开放为导向，冀望通过加强交通、能源和网络等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建设，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以此来解决经济增长和平衡问题。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元开放包容的合作性倡议。可以说，“一带一路”的开放包容性特征是区别于其他区域性经济倡议的一个突出特点。

“一带一路”是务实合作平台，而非中国的地缘政治工具。“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成为人类共有的历史财富，“一带一路”就是秉承这一精神与原则提出的现时代重要倡议。通过加强相关国家间的全方位多层次交流合作，充分发掘与发挥各国的发展潜力与比较优势，彼此形成了互利共赢的区域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在这一机制中，各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受益者。因此，“一带一路”从一开始就具有平等性、和平性特征。平等是中国所坚持的重要国际准则，也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基础。只有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合作才能是持久的合作，也才会是互利的合作。“一带一路”平等包容的合作特征为其推进减轻了阻力，提

升了共建效率，有助于国际合作真正“落地生根”。同时，“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和地区环境，和平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本质属性，也是保障其顺利推进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些就决定了“一带一路”不应该也不可能沦为大国政治较量的工具，更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

“一带一路”是共商共建共享的联动发展倡议，而非中国的对外援助计划。“一带一路”建设是双边或多边联动基础上通过具体项目加以推进的，是在进行充分政策沟通、战略对接以及市场运作后形成的发展倡议与规划。2017年5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中强调了建设“一带一路”的基本原则，其中就包括市场原则，即充分认识市场作用和企业主体地位，确保政府发挥适当作用，政府采购程序应开放、透明、非歧视。可见，“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主体与支撑力量并不在政府，而是企业，根本方法是遵循市场规律，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来实现参与各方的利益诉求，政府在其中发挥构建平台、创立机制、政策引导等指向性、服务性功能。

“一带一路”是和现有机制的对接与互补，而非替代。“一带一路”建设的相关国家要素禀赋各异，比较优势差异明显，互补性很强。有的国家能源资源丰富但开发力度不够，有的国家劳动力充裕但就业岗位不足，有的国家市场空间广阔但产业基础薄弱，有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需求旺盛但资金紧缺。我国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优势产业越来越多，基础设施建设经验丰富，装备制造能力强、质量好、性价比高，具备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综合优势。这就为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参与方实现产业对接与优势互补提供了现实需要与重大机遇。因而，“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就是要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对接各国政策和发展战略，以便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协调联动发展，实现共同繁荣。显然，它不是对现有地区合作机制的替代，而是与现有机制互为助力、相互补充。实际上，“一带一路”建设已经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发展规划、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经济发展战略、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欧盟欧洲投资计划、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实现了对接与合作，并形成了一批标志性项目，如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建设。作为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建设成果之一，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初步实现了深水大港、远洋干线、中欧班列、物流场站的无缝对接。该项目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发展战略高度契合。哈萨克斯坦“光明道路”党主席佩鲁阿舍夫就表示，在与“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的对接中，“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推动了哈萨克斯坦乃至整个中亚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各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开辟了广阔空间，创造了更多机遇。

“一带一路”建设是促进人文交流

的桥梁，而非触发文明冲突的引线。“一带一路”跨越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但它带来的不是文明冲突，而是各文明间的交流互鉴。“一带一路”在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产能合作与发展战略对接的同时，也将“民心相通”作为工作重心之一。通过弘扬丝绸之路精神，开展智力丝绸之路、健康丝绸之路等建设，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民间交往等各领域广泛开展合作，“一带一路”建设民意基础更为坚实，社会根基更加牢固。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一带一路”建设非常重要，“它是政治经济文化上的桥梁和纽带，让人们跨越国界更好交流”。因而，“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为相关国家民众加强交流、增进理解搭起了新的桥梁，为不同文化和文明加强对话、交流互鉴织就了新的纽带，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

“一带一路”的国际意义

“一带一路”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领域更为广阔。它不仅给参与各方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合作红利，也为世界贡献了应对挑战、创造机遇、强化信心的智慧与力量。

“一带一路”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路径与方向。当今世界，挑战频发、风险日益增多。经济增长乏力，动能不足，金融危机的影响仍在发酵，发展鸿沟日益突出，“黑天鹅”事件频出，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抬头，“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地区动荡持续，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正摆在全人类面前。这充分说明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出现了结构性问题，亟须找到新的破题之策与应对方略。作为一个新兴大国，中国有能力、有意愿同时也有责任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与力量。面对新挑战新问题新情况，中国给出的全球治理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而“一带一路”正是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的具体实践。“一带一路”强调各国的平等参与、包容普惠，主张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共同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正是本着这样的原则与理念，“一带一路”针对各国发展的现实问题和治理体系的短板，创立了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新型国际机制，构建了多形式、多渠道的交流合作平台，这既能缓解当今全球治理机制代表性、有效性、及时性难以适应现实需求的困境，并在一定程度上扭转公共产品供应不足的局面，提振国际社会参与全球治理的士气与信心，同时又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变革全球治理机制的现实要求，大大增强了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是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大突破。

“一带一路”为新时期世界走向共赢带来了中国方案。不同性质、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其具体的战略诉求与优先方向不尽相同，但各国都希望获得发展与繁荣，这便找到了各国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如何将一国的发展规划与他国的战略设计相对接，实现优势互补便成为各国实现双赢多赢的重要前提。“一带一路”正是在各国寻求发展机遇的需求之下，同时尊重各自发展道路选择基础之上所形成的合作平台。因为立足于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聚焦于各国发展实际与现实需要，着力于和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在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世界认可与赞誉的同时，也取得了日益显著的早期收获，给相关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给世界带来了走向普惠、均衡、可持续繁荣的信心。2016年10月开通的非洲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亚的斯亚贝巴至吉布提）和2017年5月开通的蒙内铁路（蒙巴萨至内罗毕），成为中国在非洲大陆承建的两大极具影响力的世纪工程，受到许多非洲国家好评，被誉为“友谊合作之路”和“繁荣发展之路”。从中非合作的缩影可以看出，“一带一路”是一条合作之路，更是一条希望之路、共赢之路。

“一带一路”为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提供了新平台。“一带一路”涵盖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实现了“南南合作”与“南北合作”的统一，有助于推动全球均衡可持续发展。“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着眼点，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协调。对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一次搭中国经济发展“快车”“便车”，实现自身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性机遇，有力推动的南南合作的广泛展开，同时也有助于增进南北对话，促进南北合作的深度发展。不仅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和方向，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高度契合，完全能够加强对接，实现相互促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都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都试图提供机会、全球公共产品和双赢合作，都致力于深化国家和区域间的联系。他强调，为了让相关国家能够充分从增加联系产生的潜力中获益，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联系至关重要。就此而言，“一带一路”建设还有助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顺利实现。

写下了《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一书的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弗兰科潘说：“丝绸之路曾经塑造了过去的世界，甚至塑造了当今的世界，也将塑造未来的世界。”作为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必将会行稳致远，惠及天下。

战略视角

梦、新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国家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大原创性贡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得到了创造性升华、开辟了崭新境界，在当代中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行动力。

要看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且是一个指导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阔步前进的战略体系。由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和在实践中的广泛运用，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在经历世界社会主义低潮之后，首次发生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充分展示了科学理论的实践力量。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预见到他们的科学理论能够对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发挥决定性影响，但他们预见到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出现，认为它将不同于“欧洲社会主义”；他们还预见到中国将对世界文明进程产生新的重大影响，期望中国革命和建设能够促成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崩溃和社会主义新文明的诞生。由于中国革

命的胜利，由于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尤其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深入发展，他们的预言正在成为现实。

从《宣言》7篇序言就可以看到，在40多年的时间里，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马克思恩格斯的认识也有了很大改变。《宣言》发表已经170年，这期间世界形势变化的广度和深度，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的，我们更不能指望他们为今天的事情提供标准答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正处于百年不遇之大变局，中国也正处于实现伟大梦想的关键期，世界之变、西方之乱与中国之治形成鲜明对比，新的时代课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去解答。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坚持和创造性发展，续写着21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时代洪流滚滚向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引下，正在以豪迈的步伐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作者系中央党校科研部主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秘书长）

缘何中澳风波关系再起

□ 马 丽

近日，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事务部长批评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援助计划，澳网公开赛因售卖中国矿泉水也成为众矢之的，被一些澳媒体和网民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自2017年底以来，澳媒体所谓中国对澳进行影响渗透的报道甚嚣尘上。澳不同地方发生数起侮辱、殴打中国留学人员的事件。澳领导人带有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言论令人匪夷所思。人们不禁纳闷澳大利亚反华调门缘何越唱越高，让中澳关系风波再起。

澳对华心态矛盾复杂。澳大利亚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上无疑是西方国家，但在地理上却远离西方，与亚洲国家相邻。独特的地理位置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让澳成为连接东西方的纽带与桥梁，也为澳对外政策的定位和取向增添了些许困惑和迷茫。

2017年11月发布的澳外交政策白皮书反复强调“变化”和“不确定性”，折射出澳对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发展的担忧，特别是对美国在亚太地区作用和影响力的焦虑。作为美国的盟友，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相似与认同使澳对美主导地区和国际事务形成惯性思维。白皮书称澳美同盟关系是澳印太政策的中心，一定程度上迎合了美国总统特朗普亚太之行提出的“印度洋—太平洋”概念。

鉴于中国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白皮书不得不对中国发展和中澳关系总体予以积极评价，但字里行间对中国影响力上流露出的更多是担心和忧虑，而且在南海形势总体趋于稳定的背景下周顾事实对中国点名批评。这种一边“表扬”一边批评的思路看似兼顾周到，却恰恰反映出澳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的矛盾心态。

澳党派争斗效应外溢。澳执政的自由国家党联盟与反对党工党去年以来围绕国会议员双重国籍身份问题展开较量。澳副总理、国家党领导人巴纳比·乔伊斯，自由党议员约翰·亚历山大等因持双重国籍被澳高等法院裁决议员身份无效，后通过放弃外国国籍和补选恢复职位，使执政联盟在议会重获微弱优势。

与此同时，澳媒体报道工党议员山姆·达斯特阿里（中文名邓森）与中国富商关系密切，对南海问题的表态涉嫌出卖澳国家利益。这成为执政联盟对党工党反击和打压的绝佳借口。总理特恩布尔指责该议员行为危害澳国家安全，宣布将禁止外国人向澳政党提供政治献金，并向议会提交法案，拟通过立法抵制“外国渗透”。令人遗憾的是澳媒体和政府将矛头指向中国，称中国影响和干预澳政治进程，使澳党派争斗殃及中澳关系发展。

澳政府利用民众恐慌心理和

中外关系